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 逻辑演绎 下

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张师伟◎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书系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 逻辑演绎 下

Logical Interpretation
on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张师伟◎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五章 角色范式:民本价值及君臣角色反思

隋唐五代的中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治乱循环,由于政治形势的逼迫及许多儒家人士的自觉努力,这个时代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有许多新的重大创造,而且在政治思想上也呈现出了承前启后的过渡特征。有学者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水平比较低,或者干脆认为七世纪初叶至八世纪的唐王朝尽管在政治上达到了盛世,但在思想文化上却表现为一个“盛世的平庸”。^①实际上,唐鼎盛时期的七世纪初叶至八世纪前半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不论是在思考内容的广阔性上,还是在思想方法的多样性上,抑或是在思想成果的精深细密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骄人业绩。如果没有七世纪初叶至八世纪前半期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创新,宋明理学的兴起几乎不可能,宋明理学的许多概念、命题和判断等直接继承或沿用了隋唐佛学的思想成果。^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隋唐五代时期的成就主要就表现在政治哲学上,其中佛教政治哲学的发展最为重要。

本章主要介绍隋唐五代时期儒学复兴背景下的政治角色反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浓郁的形而上诉求中走出来的中国政治哲学,随着隋唐帝国秩序的建立而在主题上有了划时代的巨变。一方面,隋唐时期的政治哲学继续追问着形而上的问题,但又明确地将此类问题归入佛教,通过中国化佛教在本体论及世界观方面的理论创获,解决人们关于生死、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等人生境遇方面的困惑,并引导人们建构起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世俗主义的抬头又驱使人们思考不同人应扮演的政治角色问题,从解决好世俗政治秩序的角度,深入细致地思考关于政治角色的诸多规范,敲定君当如何、臣当如何、民当如何等的行为范式。隋唐五代时期的不少帝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5页。

② 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42页。

王将相及儒家学者都深入地讨论了政治角色的应然规范,不厌其烦地谈论着“为君难为臣不易”的角色反思话题,其中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唐玄宗的《孝经注》等,都在思考传统理想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角色行为规范问题,在君当如何、臣当如何、父当如何、子当如何等方面有较深入的探讨。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通过《贞观政要》,留下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角色的典范,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政治实践。隋唐五代时期,思想界对政治角色规范的反思体现了儒家传统重人、重民的指导思想,在确立不同政治角色的行为规范时,思想家所参照的基本原则和准则却是汉代的三纲五常。

一、隋唐五代君臣的政治角色反思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政治史上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政策纲要既是儒家政治思想复兴的表现,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秦汉时期的天人系统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格本体论不同,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理论主要考虑的是不同政治角色的行为规范,君、臣、民等该如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宰相该发挥何等作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怎样处理,政治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如此等等的问题在这个时期有广泛深入的讨论。这个阶段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经验世界中政治秩序的建构及角色规范的梳理,韩愈等虽然主张“天”作为一种至善主宰的含义,并突出“天”在政治秩序维护中的基础性地位,但是他的深入反思和留给后世的主要思想影响,仍然是经验世界中的政治秩序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出现了帝王形象的两极化,隋炀帝和唐太宗分别成了暴君和圣君的符号代表,成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经常要提到的讨论对象,既对君君臣臣的政治角色规范及政治秩序维护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又对辽夏金元清诸少数民族统治政权的汉化、儒家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就总的方面来看,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潮已经走出了形而上学的迷雾,而专注于政治秩序及角色规范等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回到了汉代纲常伦理的结论上,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在思想意识上,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潮又确实经历了魏晋以来的形而上学困惑。它虽然貌似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困惑,但实际上它不过是将形而上学的解释及解答交给了中国化的佛教,而佛教理论也确实在影响着芸芸众生的政治心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隋唐时期的政治思潮表面

上具有极其明显的儒家特征,似乎在政治观念层面上儒家又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其实儒家在政治问题上的诸多观点都需要来自佛教、道家的某些重要支撑,特别是在形而上层面,儒家实际上需要佛教提供诸如因果等范畴的普遍依据,而在统治方法上也明显地受到了道家、道教等的影响。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是这个时期政治思潮发展的头等大事,但这种复兴发生在魏晋以来玄学、佛学及道家、道教的强势之后,没有比较完善地独立解决政治的诸多形而上的难题,因而儒家在隋唐的复兴仅仅是指取得了儒、释、道并立的均势,虽然诸多政治结论又回到了汉儒的纲常伦理,但其论证则基本限于经验世界如何体现儒家普遍价值。

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并立既体现了一种思想均势,也呈现出了儒释道在解决人类面临诸问题方面的完整思维。那个时代有影响的思想人物,不仅绝大多数人都兼具儒释道的思想成分,而且大多数人均相信儒释道殊途同归,皆有利于“王者之治”,著名的政治家也大都同时尊崇儒释道三教,奉行儒释道并立的文化政策。^① 儒释道在当时多数人的思维及思想中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颇有时代风格的思想推理体系。儒家思想的复兴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只是抬高儒家纲常伦理的思想地位,发挥它影响和规范社会政治秩序、政治角色的功能,儒家思想在吸收消化佛道产生宋学之前,还无力独自解决其价值理想的形而上本体依据及回归本体的修养方法、途径等问题,而儒家需要吸收的佛道两家理论在隋唐时期还处在创造阶段。隋唐之初,儒家思想的复兴首先是宗教氛围淡化后传统实用理性的再度突出,其典型标志就是思想上的重民。^② 隋唐五代时期政治思想界关于政治角色的反思,就是发生在重人、重民而不废佛道之神的情况下,是在承认人类社会需要神灵的前提下发生的规范性角色反思,其与植根于人的普遍本体而进行的政治角色反思迥然不同。

(一) 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

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政治制度等的影响一直非常强势,其它政治思想在这方面很难与儒家相比,从这方面说,儒家政治思想在中国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几乎没有被削弱过,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复兴。尽管如此,儒家政

① 张岂之等:《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8~239页。

②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4~199页。

治思想所提倡的政治价值及表现形式的依据却会时不时地被人怀疑,这种怀疑的目的也并非是为了推翻或替代儒家所提出的政治价值追求,更不是要剔除儒家政治思想对政治制度等的决定性影响。恰恰相反,人们对儒家政治思想某些方面的怀疑往往是希望儒家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因而怀疑往往是产生在最需要理论支持的方面,而怀疑的结果也往往是促进了儒家政治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升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确实面临着被怀疑的窘境,儒家成了徒具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时代的真正思想重心则是佛教理论。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政治思想仍然保留了形式上的政治权威,甚至重视佛教的梁武帝萧衍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振兴儒家思想,至于北朝统治者更是为了争得政治正统地位而争相复兴儒学,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应该算是北魏孝文帝和前秦帝国的苻坚。但不管统治者如何崇儒重道,儒家政治思想的思想地位还是处在历史的最低点上,儒家政治思想对人的客观影响比较微弱,人们关注的更多问题乃是人生的意义及基本根据,而不是人生的社会形式,佛教在思想上远比儒家更有权威。魏晋时期的中国社会恰如青春年少的美少年,他已经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开始对人生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哲学问题,想要在短暂的人生中得到一点永恒,在得到满意解答以前,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成天愁眉不展,愁到简直要失去生存的信心,他心里有许多没有充分依据的梦,有时候他真愿意只存在于梦中,而在许多时候,他都沉浸在宗教性境界中,探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问题。但正如人的青春期迟早会消失一样,社会发展的青春年少阶段也必然会翻过,人生的苦闷和徘徊依旧,但人却不能不直面自己的现实生活,也许好多有意义的选择正在等着他,他的同伴们已经恢复了人生的乐观和理想,这个时候,他就会倍加亲近那些强调责任和义务等的政治思想,从而开始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隋唐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既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政治思想发展的继续,又是中国社会从宗教沉迷中走出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一旦从宗教返回现实世界,儒家政治思想就自然地成了许多人的精神支柱,现实的中国社会只能是儒家政治思想主导的社会,而现实的中国人也大多会归宗于儒家,儒家的伦理纲常总是作为理论体系的结果被普遍接受,而人们经常追问的问题也往往集中在如何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提供理论方面的普遍必然证明,道家、佛教等的理论往往为儒家理想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隋唐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价值得到了人们的真诚信仰,名教纲常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指导原则,重人、重民的民本传统得到了弘扬,济世救民弘道的人格理想又得到了大量传播,许多人被儒家所提倡的理想人格所激励,走上了立德、立言和建功立业的人生道路。^① 儒家政治思想在隋唐时期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儒家政治思想可以恢复到独霸和独尊的地位,而仅仅意味着儒家政治思想对人生的支配性或主宰性地位,其它两家的思想仍然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除少数思想家外,许多人都坚持或认可儒家、道家和佛教的“三教并立”。当时人们大多能够在儒释道三种思想体系之间保持某种良好的协调或平衡关系,儒以治世,道以养生,佛以养性。实在说来,儒家政治思想的思维水平仍然停留在汉代,基本的思维方法仍然是天人感应思维,所不同的是隋唐儒家政治思想多少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思维方法稍显丰富。隋代大儒王通的政治思想体现了这种特点。王通,生于公元五八四年,卒于公元六一七年,河东绛州龙门人,出身官宦儒学世家,从小受儒学熏陶,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公元六〇三年,西游长安觐见隋文帝,上《太平策》,曾任“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②,讲学于河汾之间,直至终老,门人私谥为“文中子”,著作被门人仿照《论语》体例整理为《文中子》十卷。王通的政治思想主要为儒家政治思想,提倡尊王道,倡导“生以救时,死以明道”的人生观。他依据孟子的“仁政”学说,宣传王道政治,提出推行王道的基本原则,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行,强调儒家的“仁义”为“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③。王通认为,儒、释、道皆有利于政治,不可偏废,提倡“三教可一”,“立足于儒学来谈论三教的内在一致性”,王通政治思想的主旨是“以周孔之道为主干”,“兼容佛道”,“通变、无弊的统治思想”。^④ 在政治关系及其理论依据的铺陈上,王通仍沿用汉儒的天人相与思维,强调“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⑤。王通仍然保留着汉代天人感应的思维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还痴迷于五德终始说,建议新兴的隋代“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5~127页。

② 《旧唐书·王勃传》。

③ 《文中子·礼乐》。

④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

⑤ 《文中子·述史》。

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①王通在儒学的思维结构上仍然保留有汉代宇宙系统论的轮廓,仍然存在着将天神秘化、伦理化的思想成分,其在儒学向来的抱负上强化了儒家之道在社会中的权威性,突出了儒家政治理想的导向性,强调政治务必要“以三代之法统天下”,要充分发挥礼乐的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孟子“诛独夫”的革命理论。但他在政治思想上显然还缺乏应有的综合性,还未能能在思想上综合魏晋以来不同派别、风格的概念、命题。因此,王通的出现及其被推崇应该说只能算是一个信号,一个儒家思想即将大行于世的信号。

王通的政治思想没有被付诸实践,在思想上也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虽然他教授的学生中产生了许多名臣,这些名臣的政治思想明显属于儒家,但是这些名臣却几乎没有提到王通的影响,甚至在《隋书》中也没有留下王通的详细传记。隋代的帝王在政治思想的形式上也保持着王通式的结构,三教并存,儒家为主,只是隋代帝王比王通更亲信佛教。王通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复兴加快了脚步,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特别是《五经正义》的编撰,简直成了儒家政治思想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与王通的观点不够系统深入相比,孔颖达通过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对数百年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观念进行了整合和加工,在隋唐儒学复兴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它由国家诏令颁行,是唐宋时代学校教育的标准教材。它在理论上博采众说,自成一体,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及教育思想等方面,多有重要建树,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经正义》是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学术融合的产物,也体现了融合儒家思想的南学传统和北学传统的努力,具有一定的思想综合性。不过,由于主持其事的孔颖达坚持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原则,以南治南,以北治北,《五经正义》基本上还保持了比较丰富的南学和北学传统,从而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儒家经典。毋庸讳言,《五经正义》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学术文献,它在某些方面具有政治思想法典的性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唐初政治思想界的主流思想。就思想内容而言,《五经正义》代表着隋唐之际儒学的主流和最高成果。

孔颖达作为《五经正义》的主编,在儒家经学史上有重要影响,其政治思

^① 《文中子·关朗》。

想在隋唐之际的思想界颇具代表性。孔颖达,生于公元五七五年,卒于公元六四八年,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孔子后裔,隋唐之际著名的经学家和儒家思想家。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学冠群儒,他“明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诗》《礼记》,王氏《易》,善属文,通步历”^①。孔颖达在唐初历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给事中,国子祭酒,封曲阜县子,是唐太宗的重要佐臣之一,他受唐太宗之命进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五经正义》是一部传统政治思维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体察到在儒家学说中,道由伦理范畴上升为最高政治哲学范畴的发展过程。”^②孔颖达在“道”的名义下,以儒学为基础和核心,把名教论与自然论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本体论证政治伦理,反过来又以政治伦理论证自然本体,为宋代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辨开辟了道路。^③孔颖达力图建立哲学本体论和伦理政治学相统一的学说,反映了儒家思想对自然、社会、人生以及人类思维一般规律和规定性等的认识的深化。他还把天地、伦理、礼法、仁义、中庸、无为等都纳入了道,使道的内涵覆盖了包括政治哲学、制度原理、社会关系、政治原则及各种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的广大领域,从而以“道”为核心概念,构造了系统而完整的政治理论体系,把宇宙本体、自然法则、最高道德规范和基本政治原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君道理论,以及把王权、认识、道德、政治和社会规范合而为一,全面地论证了君主制度的合理性和绝对性。^④《五经正义》铺陈了将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结合起来的道论,阐述了以礼仁为中心的治国之道和君德论,相互贯通,相互论证,相互补充,融哲学、政治、伦理为一体,深层次、多角度地论证了君主政治的一般原则与要求,使儒家政治学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⑤同时,《五经正义》还解决了隋唐时期儒学复兴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它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和凝聚力;扫清了汉代以来天人感应论的流弊,改变了儒学形象;改造了儒家经学方法,面向实际,提倡经世致用;弘扬周孔道统,同佛、道等阵营划清思想界限;借鉴佛、道理论的思辨成果,补充、完善和发展儒学理论,取得了在理论思维方面抗衡佛、道的资本等。^⑥《五经正义》对儒学复兴的贡献是最全面的,其影响也

① 《新唐书·孔颖达传》。

②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③④⑤⑥ 刘泽华、张分田:《孔颖达的道论和治道》,《孔子研究》,1991年第3期。

是极为深远的。

（二）隋文帝孜孜求治的统治思想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短命而非常有创意的王朝,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重要政治制度就是由这些短命王朝创立的。不仅如此,这些短命王朝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短命而亡的王朝往往成了仁人志士进行政治思考或反思的反面政治典型,从而形成了政治思想中的常见话题,对中国政治思想讨论题材的丰富具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短命王朝创制的主要政治制度也融入了人们的政治思想,影响了人们的普遍政治思维,特别是秦始皇创制的皇帝制度简直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此外,短命王朝的君主往往具有政治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他们在行动上或在言行方面总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者主要体现了某一学派的政治观点,或者提出了有重要影响的治国纲领,或者制定了某种典型性的政策,或者直接采取政治行为等,都可以作为广义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隋朝的历史开始于公元五八一年,终止于公元六一八年,前后只有不足四十年时间,只经历了文帝和炀帝两代帝王,可算是一个短命的封建王朝。从广义政治思想的角度看,隋文帝和隋炀帝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一个是励精图治的隋朝开国皇帝,一个是荒淫无度而好大喜功的隋朝亡国之君。不过,隋炀帝主要是作为中国政治传统的反面典型出现在人们的记忆或话题中的,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说,隋炀帝在政治思想上,远没有隋文帝更有研究价值。

隋文帝杨坚,弘农华阴人,其父杨忠追随宇文泰,在西魏、北周时期屡经战阵,立有战功,为府兵的十二大将军之一,受封为隋国公。杨坚承袭其父隋国公之爵,娶鲜卑贵族独孤信之女为妻,其长女嫁周宣帝为皇后,门第显赫,位高权重,宣帝去世后,执掌北周政权,他革除周宣帝的种种弊政,实行较为简约宽大的刑罚,得到了朝野大部分人士的政治支持,获得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公元五八一年,杨坚废周静帝,受周禅,建立隋朝,并于五八九年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杨坚自小生活在佛寺中,受佛教的影响甚深,后入太学学习儒家学说,在政治意识上对儒释道都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尊崇,而这种尊崇在某种意义上又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比如,他将新朝新君年号定为“开

皇”就“可谓八面玲珑,充分表现出利用各种宗教为政治服务的态度”^①。儒家的孝道自后汉时期就是统治伦理的底线,西晋统治者标榜孝道,但难掩国家大肆渲染背后的矫揉造作和惺惺作态,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为争权夺利而肆意践踏儒家孝道,“八王之乱”“宣告了其统治伦理的彻底破产”,“大动乱、大破坏造成了精神的大崩溃”,“新起的统治阶层本无多少文化素养,主要依仗手中的军事实力改朝换代”,“唯权力论和金钱崇拜也弥漫于世”,“穷奢极欲,凶暴肆虐,是南北朝统治阶层共同的现象”,“荒淫暴君,多不胜数”。^②西晋“永嘉之乱”以后,汉儒标榜的价值理想及政治人格完全被践踏殆尽,南北朝不同历史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由于缺乏正面的价值引导及理想人格等方面的约束,大多陷入了贪欲与暴力的陷阱,沦为了人格变态的暴君,他们肆意地践踏人伦,施暴、虐待、逞凶。南北朝“统治者既以马上得天下,便以为亦须以马上治天下,其家庭教育,自然以弓马悍勇为崇”,“如此家教,再加上亲眼目睹父兄贵戚的诸般暴行,自然培养出一代浑身戾气的子弟,自幼骄横鄙俗,无法无天,在灌满有权就有一切的脑袋下,闪烁着一双喷射物欲、色欲和权力欲火焰的眼睛,把四周的一切都看成猎物,把人的世界变成动物的世界”。^③“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不能不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在相互倾轧的明争暗斗中,带着精神上的创伤”,“即使是那些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的人物,也无法完全从这种时代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从而难免带有刻忌、残忍和难以理喻的乖张焦躁”。^④隋文帝杨坚就是这样一个“带有刻忌、残忍和难以理喻的乖张焦躁”的杰出人物,但他又将儒家民本仁爱的君主角色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开启了反思君主角色范式的门阙,迎来了在政治观念上从魏晋南北朝进入隋唐的第一缕阳光。

隋文帝的政治思想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著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隋文帝受儒释道三教观念影响,在执政、行政上确立了天命论的指导思想。杨坚具有浓郁的天命论思想,其天命论与儒释道三教相通,儒释道都为隋文帝杨坚提供了天命论的理论资源,确立了其牢固的天命思想。

① 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② 同上,第15~21页。

③ 同上,第21页。

④ 同上,第24页。

杨坚生于一个佛教氛围浓郁的时代,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武将多尊崇佛教,杨坚的父母及岳父母都笃信佛教,佛教对隋文帝夫妇的影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杨坚生于佛寺,并在佛寺中接受了最初的文化教育,他的思想观念深受佛教信仰的影响,其小名“那罗延”即是梵文 Nārāyaṇa 音译,在佛典里指金刚力士、坚固力士等力大无穷的神祇。他自幼即被反复告知自己是金刚转世,他也确信自己就是那个“那罗延神王”。佛教的天命论强调“因集业故,生于人中,王领国土,故称人王”,人王“处在胎中,诸天守护,或先守护,然后入胎,虽在人中,生为人王,以天护故,复称天子”,“三十三天,各以己德,分与是人,故称天子”。^① 杨坚的诞生传说及开国以“开皇”为年号,均合乎佛教天命论的理论,即“赤若之岁,黄屋馭时,土制水行,兴废毁立,佛日火生,木运启年,号以开皇,可谓法炬灭而更明,否时还泰者也”,“开皇”意味着杨坚“祇奉上玄,君临万国”。^② “开皇”的年号还顺应了道教的劫数理论,《隋书经籍四》记载“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由于“其开劫,非一度也,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开皇作为一个道教的年号,预示着五方天帝及诸仙官,“转共承受,开劫度人”。杨坚十四岁入太学,接受儒家教育,汉儒天人感应思想也浸入了他的天命观念中,他一方面屡屡表示“受天命”,另一方面又按照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理论来确定新朝的正朔及服色等,“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③。

其二,隋文帝具有较强的制度化思维,在儒家化的律令礼乐建设方面有明显的创造性及较深远的历史影响。隋朝开国时,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变革,这一方面是出于恢复汉官威仪追求政治合法性的需要。隋朝开国“易周氏官仪,依汉、魏之旧”,“恢复少数民族政权以前的中国制度文化,是隋朝君臣的共识,意在洗净狭隘的民族政权色彩,以争得举世公认的正统地位,重新构建以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统一的国家”。^④ “当杨坚君臣褪下北周不

①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二《金光明经·正论品等十一》,见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② 《隋书·高祖上》,开皇二年六月丙申诏。

③ 《隋书·高祖上》。

④ 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121页。

伦不类的仿古衣冠,换上传统汉服出现时,人们奔走相告,仿佛云开日出,重见中华文明的耀眼光芒,那种兴奋、激动、喜悦的心情,在一片欢呼声中,随着滚滚热泪,冲决长期压抑在心头的屈辱而迸发出来”,“数百年的民族压迫过去了,历史确实实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通过这简短的朝会仪式,隋朝赢得了广泛的支持”。^① 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律令礼乐更张及制度变革,又确实体现了杨坚等人变革政治制度的宏愿和精明务实的政治风格。律令礼乐是中国传统的基本社会规范,隋文帝捐弃前代酷法,将儒家礼教的内容法律化,将儒家的亲亲尊尊法律化,创设“十恶”之制,既重视对违反儒家纲常伦理行为的惩处,又重视以律令礼乐的形式维护中央集权及君主集权,他积极创新立法形式,对前代法典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将规章体系厘定为律、令、格、式四大类,其区别从继承隋法的唐代文献来看,“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②,开创了中国传统律法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隋文帝还相当重视修礼,开皇五年颁布《隋朝仪礼》,对传统礼制多有创新,是当时南朝与北齐礼学的集大成。隋朝开国实行的三省六部制继承了汉魏以来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传统,综合吸收汉魏南北朝以来多次制度变革的积极成果,破旧立新,精简整顿,实现了宰相制度的重大变革,宰相由三省长官共同担任,取代了秦汉以来的个人开府宰相制,有效地预防了权臣专制。

其三,隋文帝表现出了历代帝王难得一见的克己勤政和孜孜以为民。一方面,他生活简朴,不尚奢华,平时吃饭只一道荤菜,六宫都穿洗的衣服,乘坐的舆辇一修再修,他在理论上还将克己同天道、天意联系起来,教育子弟官员,“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③。他“从政治的高度崇俭倡廉,推进了开皇年间朴实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有序的管理”^④。另一方面,隋文帝将自己的精力倾注在了勤政为民上。他庶政亲操,为政细腻,呕心沥血,不知疲倦,焚膏继晷地批阅文件,不拘细小,事必躬亲,这种行政风格,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一定的典型性。他在临终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感慨其行政:“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

① 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②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第六《刑部尚书·刑部郎中》,中华书局,1992年。

③ 《隋书·房龄王勇传》。

④ 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①贞观名臣萧瑀也积极地评价了隋文帝的克己勤政,“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②。隋文帝的克己勤政立足于地方官的经历,这既是深知百姓疾苦而又同情百姓的一种行政立场,也是一种深知官场弊端的行政方法,还体现着一种站在小民立场上除恶务尽的那种执着,在这一点上,隋文帝与明太祖颇为接近。他的勤政体现着孜孜以为民的行政情怀。隋文帝注意防止官吏及公文的蒙蔽,频频派员巡省地方风俗,自己也经常出巡,亲自受理百姓上诉,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曾经面对着百姓在灾年吃的豆屑杂糠泪流满面,并为此而不食酒肉近一年。在与遭受饥荒的百姓一路同行时,隋文帝禁止卫士驱赶挤进仪仗卫队中的百姓,他还给扶老携幼者让路,在山险路隘时,他还命令卫队帮助挑担者。

隋文帝是一个过渡时代的转折人物,其政治思想也充分折射出了三教并立情况下的总体格局及基本走势。就总体格局而论,不仅儒、释、道在政治思维中的作用均在一定程度上被承认,而且儒、释、道的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普遍理解。杨坚的天命论同时联系着儒、释、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证据。就基本走势而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儒家化特征将越来越自觉,儒家一贯强调的价值性判断如民本、重民、重人等将越来越得到认同,而且政治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将围绕着儒家化的政治角色规范来展开,并凝结为一个颇为流行的政治话题或命题:为君难,为臣亦不易。

(三)唐太宗政治思想的榜样意义

隋朝的短命而亡既给唐初的政治人物提供了政治反思的题材,也提供了进行政治反思的动力。这种反思促进了儒、释、道思想的发展,促成了三教并存、三教相通的基本思想格局,促进了儒家理想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复兴,在吸收道家自然无为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创造了作为传统政治盛世样板的贞观盛世。唐初的政治反思并未攻讦隋朝的制度框架,而是集中反思隋朝的行政思想或执政观念,或者说更多的是反思天、君、臣、民等不同政治角

① 《隋书·高祖下》。

②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

色的行为范式,尤其集中反思了君臣的行为范式。唐太宗作为一代卓越的政治领袖,他通过君臣论道的形式,组织了系统的政治范式反思,以身作则,带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治理团队。唐太宗及其治理团队不仅创造了一个政治治理的优秀典范,深深地影响了周围少数民族的卓越统治者,而且还在如何做领袖等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儒家文化圈的卓越管理者。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盛世,并使其具有跨越时空的政治影响力,首先得益于儒释道三教并存、三教相通的思想文化格局。贞观盛世在儒学相对黯淡的时代无法形成,因为贞观盛世就是在使天子与大臣各自坚持高标准儒家政治理想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儒家政治理想及政治价值的高调回归,就不可能产生贞观盛世。贞观盛世在儒家独尊的时代也无法形成,因为贞观盛世在方法论上受到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防止了政治上的乱为扰民。其次,隋朝的短命而亡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与素材,特别是在承认隋朝制度的合理性之后,隋朝的短命就主要归结为统治者的德与术,而唐太宗等反思的重点就是统治者的德和术,其中德是要求统治者是具有儒家意义上的理想统治者,而术则是君臣如何行为以实现政治理想的艺术。在注重以德治国的传统中国,贞观盛世具有极其强烈的榜样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五九九年生于京兆武功李家旧宅,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唐皇室李氏,若不是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就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①曾祖父李虎曾被西魏赐姓为大野氏,官至太尉,随宇文泰入关后为八驻国之一,死后被封唐国公,自曾祖以下李家世代为关陇贵族。李家同关陇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关系密切,自西魏北周以来屡屡同少数民族贵族婚配,李世民的祖母独孤氏与母亲窦氏都是鲜卑贵族之女,因独孤氏的关系,李家在隋朝开国后成为皇亲,隋文帝的独孤皇后乃是李渊的姨妈,李家与杨家的亲戚关系颇为紧密,李渊在隋朝两代帝王时都比较受重用,受封为隋朝唐国公,隋末大乱时,李渊执掌重兵,任太原留守。李家世代为武将,李渊乘天下大乱之势起兵,长驱直入,胜利进入长安,建立了唐朝。李世民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立有许多大功,是开国重大功臣之一,作为皇帝的次子,他受封为秦王。他于公元六二六年六月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高

^①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94页。

祖李渊只好顺势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于同年八月禅位于秦王李世民。唐太宗在隋末唐初屡经战阵,算得上是马上得天下的皇帝,但他的主要政治影响则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明君形象,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如何统治天下的原则及德术。唐初的许多政治制度直接继承了隋朝政治制度,李世民在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强隋和盛唐的基本政治制度已经由杨坚父子制定。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灭亡的经验,认真思考了儒家所提倡的基本政治原则,不仅执行了一系列崇儒重道的政策,而且在政治实践上开创了许多良好的政治传统,丰富和细化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创造了中国传统时代理想的政治模式,在政治文化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大致来说,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考虑的是统治者当如何统治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尤其是在确立以民本、纳谏等为主要内容的君主、臣僚行为规范方面,唐太宗君臣做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探索,他们将儒家一直以来的政治理想转化成了一系列具有典范意义的人格符号。唐太宗君臣通过人格符号展现的主要内容有:

其一,唐太宗具有集中而典型的民本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唐太宗自身就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所要求的君主的样板。隋末大乱教训了贵族出身的李世民,他看到了隐藏在民众中间的巨大力量,认识到只有不得罪于民,政治统治才能持久的道理。因此,唐太宗继承了民本思想中的畏民思想。“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无用,诚可畏也”^①，“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②。唐太宗在畏民的基础上将养民确定为政治的服务对象，强调天子的职责在存养百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③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在君道的德性要求上主要体现为君主的仁义与禁欲。李世民从君、国、民一体的高度认识到了存养百姓与正君之心、克君之欲的一致性，“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如果君主“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绝而身死，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

① 《贞观政要·政体》。

② 《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③ 《贞观政要·君道》。

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① 君主既要充分认识到“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更要明确“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② 李世民还认识到了君主修身养性对民众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民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由此发展下去势必“人神愤怒，上下乖离，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③ 唐太宗在与群臣论止盗和重法的关系时，还表现出了站在民的立场上反思的务实精神，他分析指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因为民之为盗贼是为饥寒所迫，而民之饥寒则正是由于君主的多欲和官吏的贪求，因此他认为“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④。

其二，唐太宗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实践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树立了一个模范君主形象，确立了良好的统治榜样。作为一个理想君主的范式，唐太宗李世民主要处理好了如下三方面的关系：第一，君臣都承担着天下治理的职责，唐太宗在给魏徵的诏书中提到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表达了对人臣在共为治中的职责是相君。“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而人臣的相君又可以被概括为“直辞正谏，论道佐时”，如果像何曾那样“位极台司，名器崇重”，“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⑤ 国家倾覆及社稷危亡既源于人君无道，也源于人臣奸佞，李世民以隋朝的倾覆为例，说明人臣也不得辞其咎，他说：“隋氏倾覆者，岂惟其君无道，亦由股肱无良”，隋朝大臣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居高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谄佞，蔽塞聪明，欲令其国无危，不可得也”。^⑥ 第二，君臣在天下共为治中的角色分工关键是君主要任贤能。唐太宗在与魏徵讨论如何“守天下”时就提出了其关键不过是任贤能与受谏诤，他以隋文帝为例说明不敢或不能任用贤能的极大危害。唐太宗批评隋文帝杨坚“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② 《帝范·君体》。

③ 《帝范·减盈》。

④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⑤ 《贞观政要·君道》。

⑥ 《贞观政要·行幸》。